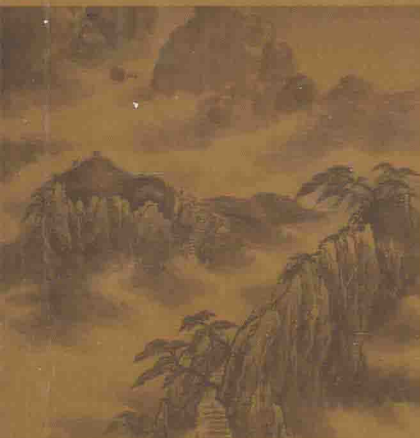




新闻传播学精品文库



兴稼传播史论集

蔡铭泽 著

本书是作者历年来所发表的新闻传播学论文选集，共分四辑，收入论文三十二篇。从中可以看出作者治学发展之轨迹，亦可窥见时代变迁中知识分子思想解放的心路历程。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J&C 新闻传播学精品文库

蔡铭泽 著

兴稼传播史论集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兴稼传播史论集/ 蔡铭泽著.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2. 12
(新闻传播学精品文库)
ISBN 978 - 7 - 5668 - 0440 - 2

I. ①兴… II. ①蔡… III. ①新闻学—传播学—中国—文集
IV. ①G219.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97746 号

兴稼传播史论集

著 者: 蔡铭泽

出 版 人: 徐义雄

策划编辑: 杜小陆 史学英

责任编辑: 史学英 沈双喜

责任校对: 卢凯婷 黄 斯

地 址: 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 510630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 广州市广海照排设计中心

印 刷: 广东省农垦总局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960mm 1/16

印 张: 21.75

字 数: 340 千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

定 价: 46.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朝花夕拾温旧梦

《兴稼传播史论集》是笔者历年来所发表的新闻传播学方面的论文选集。本书分为四辑：第一辑收录笔者20世纪80年代研究中共党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份政治机关报《向导》周报所发表的8篇论文；第二辑收录笔者20世纪90年代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及任教期间所发表的有关中国国民党党报历史研究的7篇论文；第三辑收录笔者1994年南下广州以来所发表的当代新闻事业史特别是关于新时期广东报业发展的8篇论文；第四辑收录笔者历年所发表的新闻传播理论方面的9篇论文。上述32篇论文大致文以类分，并按照发表时间之先后排列。可以说，这是一部“朝花夕拾”或“旧梦重温”式的文集，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笔者求学治学的发展轨迹，也可以隐若窥见时代大变局中知识分子思想解放的心路历程。

笔者出身于湘北贫苦农家，适逢邓公拨乱反正，才有机会上大学深造。本科入读中共党史专业，这在当时可谓“显学”，据说学成毕业后可以从政为官。后来，随着市场经济大潮不断高涨，“显学”渐“隐”，盖因其政治性太强，科学性受限。其实，中共党史属于历史科学，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一部分，既非超越海岳，亦可忝列学林。遵循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的路径，我自然进入了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领域，并注重从史论结合的角度研究新闻传播学。求学问路，幸赖诸多良师益友提携。他们的帮助与教诲，令人终生难忘。唯天性愚钝，建树甚微，无以报答师友于万一。然则，以师为范，孜孜求索，启迪后学，不亦乐乎？

大凡动乱岁月度日如年，太平时光转瞬千载。三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神州变化天翻地覆。不经意间，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过去种种，有的已经逝去，有的正在淡漠。唯一不变者，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之精神也。收入本书的所有论文，均是笔者在体验了我们民族思

2 兴稼传播史论集

想解放的过程中，实事求是、独立探索之心得。书中所涉及的一些内容，在当时均属敏感话题，需要理论勇气和科学精神去面对。正是本着这种实事求是的理论勇气和科学精神，本书才有面世的价值。

本书的出版，得益于暨南大学领导历年来倡导的严谨治学的科学研究风气，得益于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同仁的关爱，也得益于我指导的研究生朱佳家同学、田博同学、成琤同学和刘雨亭同学对书稿的认真校对，更得益于我的妻子李伊女士和爱女蔡文逸长期以来对我安于清贫、心向学问的理解与支持。对于领导、朋友和亲人的关心与帮助，在此一并深致谢忱。

蔡铭泽

2012年10月于广州松泉居

目 录

朝花夕拾温旧梦 /1

第一辑

评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等两篇文章 /2

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策略 /12

关于《向导》周报几个问题的辨析 /21

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产生的原因 /32

近代中国农民阶级的历史变迁 /42

论《向导》周报对中国大革命运动的推动和指导 /51

论《向导》周报对北伐战争的指导 /63

论《向导》周报对中国革命的理论贡献 /77

第二辑

论中国国民党党报的时代特色 /90

论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中国的舆论环境 /103

论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国民党新闻政策的演变 /115

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国民党党报的发展 /126

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国民党人的新闻思想 /140

大陆时期中国国民党党报经营管理体制的变化 /148

专制主义新闻政策和新闻自由运动 /158

第三辑

论新闻界的反右派斗争及其教训 /168

走出历史的迷雾 /178

新闻：从“批判”到“批评” /192

- 读者本位——羊城报业新天地 /202
舆论监督“步步高” /209
论《南方日报》对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宣传 /215
论新时期《南方日报》新闻批评的恢复 /227
广州三大报“非典型肺炎”事件报道研究 /241

第四辑

-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事业的发展 /257
增强市场意识，改进新闻教育 /265
新闻规避论略 /275
新闻彰显人性美 /284
论刑事案件报道中的人文关怀 /286
南宋著名理学家蔡元定生平考异 /295
好新闻的标准浅议 /308
新闻信息传情论 /315
老子传播思想探析 /327

- 附：蔡铭泽著述目录一览 /338

第一辑

评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 等两篇文章

《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①是陈独秀1923年发表的两篇主要文章。长期以来，许多人将这两篇文章作为陈独秀右倾投降理论形成的标志而一概否定。其理由是：（一）忽视和贬低了工农阶级的革命作用，夸大了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放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二）提出了一个“二次革命论”的公式。^②

我认为指出这两篇文章中的缺点和错误是有必要的，但对有的同志完全否定和忽视文章中正确的一面，又不敢苟同。

一、评陈独秀关于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陈独秀谈到资产阶级时，指出：“在产业幼稚资产阶级势力不集中的社会，尤其是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社会，资产阶级每每有分为三部分的现象：（一）是革命的资产阶级，他们因为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妨碍大规模的工商业发展而赞成革命，如中国海外侨商及长江新兴的工业家之一部分；（二）是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他们因为素来依靠外人恩惠及利用国家财政机关与军阀官僚势力，造成畸形的商业资本，专以卖国行为增加他们货币的富，他们自然而然要依附军阀官僚及帝国主义列强而反对革命，他们也可以叫做官僚的资产阶级……（三）是非革命的资产阶级，他们因为所营的工商业规模极小，没有扩大的企图，没有政治上直接的需要，

^① 这两篇文章分别刊载于1923年4月25日出版的《向导》周报第22期和1923年12月1日出版的《前锋》第2期。以下引文不注者，均见此两文。

^② 参阅陈哲夫：《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剖析》，载《历史研究》1960年第1~2期；《中国共产党历史教学大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7页。

所以对于民主革命恒取消极的中立态度，这种小工商业家，在小资产阶级的中国社会居最大多数。”这个分析尽管有不精当之处，但陈独秀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第一次把中国资产阶级区分为民族资产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三个不同部分，仍不失为一个首创。显然，当说到“资产阶级的力量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时，他所指的仅仅是民族资产阶级（即革命的资产阶级）。如果笼统地说“资产阶级的力量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当然是错误的、片面的。可是文章中的“集中”和“雄厚”是相对“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工人“在物质上他的力量自然远不及资产阶级雄厚”（着重号为笔者所加）的情形来说的。而这一认识是基本上符合中国资产阶级的客观实际的。

我们说民族资产阶级具有革命和妥协的两重性，但并不意味着这种两重性始终处于平衡状态。在一定的条件下，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的表现则有主次不同。1923年前后，中国又回到了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封建军阀连年混战，民族工业惨遭摧残，民族资产阶级的反抗情绪很大。在这种情况下，文章指出在国民运动中“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点”。但是文章并没有完全忽视资产阶级的妥协性。文章说：“幼稚的资产阶级……还未脱离利用敌人（列强及军阀）势力发展自己阶级势力的时期，所以他时常表现出来爱和平怕革命的心理。”这里，既肯定了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也指出了资产阶级的妥协性，这种认识可以说是基本正确的。

在分析农民阶级时，陈独秀的文章指出：“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被难苟安，这三种环境是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的原因。”有的专家认为，陈独秀在这里否定了农民参加革命的可能性。其实不然，他不但肯定了农民参加革命的可能性，而且强调了农民参加革命的重要性。他指出：“外货侵入破坏农业经济日益一日，兵匪扰乱，天灾流行，官绅鱼肉，这四种环境却有驱农民加入革命之可能。”又说：“农民占中国全人口之大多数，自然是国民革命之伟大的势力，中国之国民革命若不得农民之加入，终不能成功一个大的民众革命。”

文章对工人阶级分析说：“连资产阶级都很幼稚，工人阶级在客观上更是幼稚了。”说中国工人阶级比资产阶级更幼稚，当然是错误的，也不

符合近代中国阶级的实际状况。不过，陈独秀并没有因此得出工人阶级的革命性不如资产阶级的革命性的结论。他指出：“工人是社会有力的阶级，在物质上他的力量自然远不及资产阶级雄厚，而在心理上因为实际生活之压迫，往往易于促进他的决战态度，即在纯粹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中……往往成为急进的先锋，况在国民革命，工人阶级更是重要的分子了。”这里虽然没有提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但强调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决战态度及其主要地位。我们应当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权，当时全党还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是在 1925 年 1 月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解决的。

基于这样的阶级分析，陈独秀指出：“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该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句子的结构是，国民党统率资产阶级，联合无产阶级。由此很难得出如有的同志所认为的“资产阶级统率革命”、“无产阶级被统率”的结论来。若问，国民党不是资产阶级的政党吗？这个问题目前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当时党内也有过争论。但是 1923 年党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即改组后的国民党（实际改组是从 1923 年开始的）开始由资产阶级性的政党转变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至于其中哪个阶级居于主导地位的问题，当时全党还没有来得及认识，陈独秀也未能搞清楚。陈独秀后来把国民党的领导同资产阶级的领导混为一谈，那是后来的错误，应当别论。

当然，由于理论水平不高和处于某种策略上的考虑，文章中确有过分强调资产阶级革命作用的错误。例如，文章认为：“依世界的政治状况及中国的经济文化状况和在国际的地位，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正（肩）负着历史的使命。”与此相联系，文章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忽视工农阶级（特别是农民阶级）革命作用的错误。在第一篇文章中，农民基本上被排斥在革命运动之外。对此，学术界早有论述，本文无须重复。这就决定了陈独秀这两篇文章的主要方面是错误的。但是我们的任务不仅仅在于指出和批判这些错误，更在于分析产生这些错误的原因。恩格斯指出：“谁要是稍微详细地研究现代社会主义，谁就应当研究运动中的那些‘已被克服的观

点’。”^①那么，陈独秀产生这些错误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我认为从主观上讲，主要是残余于他头脑中的机械唯物论，从客观上讲，主要是受共产国际的影响。

“五四”以前，陈独秀的世界观主要是社会进化论。他认为，人仅是一种“政治动物”，“进化公例，适者生存，凡不能应四周情况之需求而自处于适应之境者，当不免于灭亡”^②。陈独秀在初步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才逐步抛弃了以前那种社会进化论，代之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他说：“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③但是他对唯物史观的接受还只是机械地套用并非辩证地理解，因而他不能把唯物史观坚持到底。他认为：“历史进化的必然现象……或者也很可愤恨，很可鄙厌，然我们主观鄙恨鄙厌心理，终于敌不过客观的历史进程之必然性。”他还认为，一定的社会政治制度一经为其经济基础所决定，便绝对支配着每一个人，“除非自杀或是单独一人逃到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绝对没有办法可以自由逃出”^④。这种观点，从经济基础出发，强调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无疑是正确的。但他机械地把人类社会同自然界相类比，认为人类社会同自然界一样，“他的实际现象是死刻板板的，不是随着你们唯物论唯心论改变的”^⑤。可见，他并没有彻底摆脱进化论的影响。在他那里，除了必然性和经济基础之外，一切偶然性、人的主观能动性全被否定了。

陈独秀用这种观点来分析中国社会阶级，就片面夸大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弱点，看不到他们的伟大力量；片面夸大了资产阶级的革命性，缩小了它的妥协性。文章认为，“产业幼稚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所以不能成功一个独立的革命势力”，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若失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他用这种观点来分析无产阶级，就会不自觉地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党的“四大”前后，陈独秀曾强调过无产阶级领导权。他指出，中国资产阶级“已是全世界反动的资产阶级之一部分，它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75页。

②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载《青年杂志》1卷6号。

③ 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载《新青年》季刊第2期。

④ 陈独秀：《和区声白讨论无政府主义》，载《新青年》9卷4号。

⑤ 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载《新青年》9卷3号。

应有的革命要求，很容易被他阶级的反动性消灭下去”^①。因此，革命的领导权只能属于无产阶级。不过在他看来，领导权是天然地落到无产阶级身上的，“是‘天然的领导权’，不用无产阶级去争”^②。这种“天然的领导权”，就是他机械唯物论最典型的表现。同时，我们还应看到他的第二篇文章比第一篇文章有所进步，而这种变化主要是受共产国际的影响。1923年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不但没有提到农民问题，而且认为工人阶级也“尚未从其他阶级中充分分化出来成为一支完全独立的社会力量”^③。这就把农民运动排斥于革命运动之外，也否认了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到了1923年5月共产国际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共产国际执委会对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指出：“一切政策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只有设法吸引中国人口中的基本部分——农民，革命才会成功”^④。因此，在1923年12月写的第二篇文章中，陈独秀就把农民问题提到了重要的位置。

二、陈独秀对于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分析

在对中国革命具体进程的认识上，以列宁为首的共产国际曾经给我们党以宝贵的理论启示。列宁指出：“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⑤但是，通过什么途径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由于历史的原因，列宁没有也不可能具体地指示出来。因此，陈独秀在联系中国实际时也不可能具体描绘出中国非资本主义的前途，而只能是这样表述：“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遍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但彼时若有特殊的环境，也许有新的变化，工人阶级在彼时能获得若干政权，乃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努力至何种程度及世界的形势而决定。一九

① 《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中之资产阶级》，载《向导》周报第136期。

② 《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9页。

③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三）》，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85页。

④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8页。

⑤ 《列宁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6页。

一七年俄罗斯的革命就是一个好例。”在这里，他借鉴的是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经验，显然没有解决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关系问题。但是，也不能据此认为这时他的“二次革命论”已经作为一个公式固定下来了。

列宁说，采用什么方法才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到达社会主义，“这是不可能预先指出的。实践经验会给我们启示的”^①。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正是如此。在对革命发展阶段的认识上，全党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党的“二大”明确指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但对两步之间的关系却作了不符合实际的论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和权力，还是不能完全解放，而且民主主义成功，幼稚的资产阶级便会迅速发展，与无产阶级处于对抗地位。因此无产阶级便须对抗资产阶级，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②党的“三大”至“五大”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大革命失败后，少数同志对此似乎有所了解，比如蔡和森同志曾经指出：“从民权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不能机械的想象如俄国一样，同时也不能像机会主义的观点，这个中间隔了一个万里长城。”“中国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到底，就不可避免的要开始社会主义的转变。”^③不过，这种观点并没有为当时主持党中央工作的同志所接受，他们在纠正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同时又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幻想在一个早晨就完成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直到1939年底1940年初毛泽东同志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这个问题才得到彻底解决。毛泽东同志指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是：“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然趋势。”^④

作为这个历史过程的一个探索者，陈独秀的认识也同样经历了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他的“二次革命论”并不是一下子作为一个公式固定下来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

有的专家认为，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早在“五四”时期就萌芽

① 《列宁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6页。

②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2年6月。

③ 《蔡和森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94~795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614页。

了。但是最近的研究成果表明,1923年以前代表陈独秀对革命发展阶段认识的是一种与“二次革命论”截然相反的观点——“一次革命论”。^①陈独秀认为:“此时我们中国不但有讲社会主义底可能性而且有急于进到社会主义底必要。”^②1923年,陈独秀的这种观点明显改变了,“二次革命论”开始萌芽。这主要表现在他的上述两篇重要文章中。随着革命的深入和工农运动的高涨,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很快出现了第一次自我否定。1924年5月,他在《关于社会主义的讲演》中正确地指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所以我们劳动阶级及社会主义的人们在中国开始工作,只有国民运动”。但是在国民运动中,“社会主义者应该注意两点:第一点,于国民运动之外,同时必须注意到劳动的宣传及组织,尽量促进其革命的精神与阶级的意识,以预备社会革命的基础。第二点,社会主义者的国民运动,要做成纯粹的国民运动(即彻底的反帝反封建和反对向资产阶级妥协的民主革命——笔者注)不可做成半国民运动”。^③显而易见,这比那种“只有一心不乱的干国民革命”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稍后,他更进一步指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决不会有欧洲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现出来(这是辛亥革命未能完成之大原因)。”^④可惜这种思想的火花仅仅一闪就迅速泯灭了。陈独秀的认识沿着错误的方向急剧滑行,最后归宿在“二次革命论”的公式上。

三、关于评陈独秀右倾思想的形成

1926年7月开始的北伐战争,标志着中国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时,作为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理论基础的“二次革命论”正式形成。这主要表现在陈独秀1926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扩大执委会会议上所作的《中央政治报告》和是年9月发表的《我们现在为什么要争斗?》的文章中。

《中央政治报告》在分析各阶级对革命的态度时说:资产阶级“在民

① 邓野:《试论“五四”后期陈独秀世界观的转变》,载《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4期。

② 陈独秀:《社会主义批判》,载《新青年》9卷3号。

③ 《六大以前》,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7页。

④ 陈独秀:《给戴季陶的一封信》,载《向导》周报第129、130期。

族民主的革命运动中，乃站在非常重要的地位，依现时世界政治环境，中国的国民革命若没有资产阶级的有力参与，必陷入异常困难或至于危险”^①。在他看来，革命的前途只有两个：“一是工农阶级领导小资产阶级，推动资产阶级，以革命手段达到民族的资本主义之建设；一是由买办性的资产阶级，并结合买办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妥协，扑灭革命运动，实现道威士的资本主义之侵略。”^②

在这里，无论哪一种前途都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前途被完全否定了。陈独秀说，如果第一种前途实现，那时“必是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并且还不是工农联合政府；在那时，在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之下，中国的资本主义当然要发展起来，也只有到那时，真正中国的资本主义才能够自由发展”^③。这种“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既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也不是工农联合政府，那就只能是以国民党为主体的各阶级联合的“国民政府”了。陈独秀认为，民主革命的胜利“若归诸国民政府国民军，至少我们能够渐渐走上对外民族独立，对内民主政治的道路”^④。

这里虽不无可取之处，但问题的核心是，在这个政权中各阶级的地位是怎样的？无产阶级要不要取得领导权？无产阶级怎样取得领导权？由于当时共产国际和我们党对这个问题还没有明确的认识，所以陈独秀对此只字未提。若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所谓“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其实质只能是资产阶级专政。至于在这个政权之下，共产党会不会同国民党左派争夺政权，陈独秀回答说：“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在国民革命时代，不会发生这类问题。”^⑤这就把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任务也抛弃了。

我们可以把陈独秀的意思归纳为下列三点：其一，民主革命胜利之后建立资产阶级政权；其二，在这个政权之下，资本主义获得自由的迅速的发展；其三，等到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再去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可见，“二次革命论”至此已经作为一个公式固定下来了，所以说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理论在此时正式形成。

① 《中共中央第三次扩大执委会议决议案》，1926年7月。

②③④⑤ 独秀：《我们现在为什么要争斗？》，载《向导》周报第172期。

四、对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等两篇文章的基本评价

在评价这两篇文章时，我们还必须顾及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陈独秀写作这两篇文章的直接着眼点是为了推动国共合作，并起过一定作用。

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的对立日趋尖锐，各种关于时局的主张（如“武力统一”、“联省自治”、“好人政府”等）纷至沓来。只有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才是挽救时局最好的主张。然而，这个主张单靠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是不可能实现的，必须组织各阶级联合的革命民族统一战线。于是，国共合作便成为中国共产党在 1923 年的中心工作。正如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所指出的，“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更是我们的中心工作”^①。共产党的一切工作必须而且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工作展开的。在陈独秀看来，“中国社会各阶级都处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及本国军阀两层严酷的压迫之下”，都一体幼稚，无力单独进行国民革命，因此“各阶级合作的国民革命，是目前的需要而且可能”。我们认为，这就是两篇文章的中心思想和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从这个角度看，文章的基本出发点是无可非议的。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孙中山先生才接受了改组中国国民党的建议，才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于是才有了 1924 年 1 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才有了 1925 年至 1927 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

诚然，在中国共产党（特别是陈独秀）的工作中，有片面强调合作而忽视必要斗争的错误。这应该从当时国共两党力量的对比上加以分析。当时，中国国民党虽然四分五裂，但它毕竟是一个有着 30 年历史、30 万党员的大党。而刚刚成立不到 3 年的中国共产党仅有党员 420 人，除广州一地外又都处于秘密状态。因此，要是国民党在政治上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尤其是在组织上降格相从，困难是很多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曾打算写信给国民党中央，“请求联席会议，但因中国的政治问题而实际上做不到，因为孙中山不承认有 C. P. 的党，

^①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载《向导》周报第 30 期。